

汉语方言“了”类标记的分化及其成因

——以山东昌乐话为例

王桂亮¹, 钟虹²

(1. 江汉大学 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武汉 430056; 2.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武汉 430079)

摘要:助词“了”在山东昌乐话中的对应形式有“溜、噠、咯”,其中“溜”与“了₁”大致对应,能用在可能补语格式“V+C+溜”中;“咯、噠”与“了₂”大致对应,二者在表意和句类选择上分工不同,“咯”侧重对事态的客观陈述,“噠”侧重表达对事态的强烈情感和确认态度。除了昌乐话,河南汝南和山东沂水、沂源、莱州等方言里“了₂”对应形式也有两个,还有些方言“了₁”的对应形式也出现分化。造成方言“了”类标记出现语音形式分化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某方言基于自身语法系统的需求,调节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对应关系趋向完善的内部动力,二是普通话和方言、方言和方言之间接触渗透带来的异语语法成分的存亡竞争。方言“了”类标记读音形式特别复杂,应重视方言语法系统的独立性,不能根据某一种方言的情况来判定普通话“了”的分合。

关键词:了;助词;山东话;昌乐话;方言语法;语音形式;类型学

中图分类号:H172.1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5)06-0119-06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6.016

由于普通话的“了”只有一个读音形式,运用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时,常常难以应对“了”极其复杂的分布状态,至今汉语学界在“了”的分合问题上仍然歧见纷现,让人莫衷一是。后来,有些学者把视线从普通话内部转移到方言上来,注意到方言里“了”类标记^①会用不同的语音形式标记不同的语法意义,并且依据此类事实来判定“了”的分合,影响较大的是洪波和史冠新先生分别参照安徽庐江话^[1]、山东临淄话^[2]里“了”类标记的情况提出的普通话“了”应该三分的看法。这种类比做法潜在的假设是方言和普通话的语法系统完全一致。然而,不同的语言(方言)始终处于变动发展过程中,汉语普通话和各地方的实际发展很难同步,二者的客观语法系统自然难以完全一致。因此,有必要从研究视角上抬高“方言”的地位,视为与普通话平等的“语言”来看待有关语法问题,或许能有更客观的结论。基于此,本文拟详细考察山东昌乐话“了”类标

记的使用情况,顺便与其他方言里“了”类标记的分化情况加以比较,以期能有新启发。

昌乐县属山东省中部潍坊市辖县。钱曾怡等认为昌乐话属于山东方言东区东潍小区(大致对应于胶辽官话区)^[3],而在《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中则划归冀鲁官话区^[4]。可见,昌乐话地处山东方言东西两区的交界地带,很容易带有过渡性特征。昌乐话的“了”类标记有三个语音形式——“溜、噠、咯”。例如:“他吃溜饭咯(他吃了饭了)。|吃溜饭噠(他吃了饭了)?”其中“溜”与“了₁”大致对应,“咯、噠”与“了₂”大致对应。本文昌乐话语料主要取自昌乐县中部的乔官镇。

一、溜[liou⁰]

1. 基本用法

昌乐话的“溜”一般用在句中动词或形容词后,表示动作完成或状态实现。总体来看,基本用法与

收稿日期:2015-05-17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 <http://qks.jhun.edu.cn/jhxs>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汉语事件表述中的时间量研究”(11BY086);江汉大学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汉语方言完成体标记的类型和特征研究——兼与武汉方言完成体比较”(14011)

作者简介:王桂亮,男,山东昌乐人,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讲师;钟虹,女,江西赣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普通话“了₁”大致相同。不同的是，“溜”有时可用在反问句或祈使句的末尾，而“了₁”不可以。例如：

- (1)吃溜饭赶集去。(吃了饭去赶集。)
 (2)着蜜蜂子蛰溜两回咯。(被蜜蜂蛰了两次了。)
 (3)麦子黄溜就快割着咯。(麦子黄了很快就可以割了。)
 (4)后日买溜新衣裳走亲戚去。(等后天买了新衣服去走亲戚。)
 (5)小王上潍坊溜?(小王去了潍坊?)
 (6)你给我吃干净溜!(你给我吃干净!)

例(1)—(4)中“溜”的用法与“了₁”类似：例(1)(2)中“溜”用在句中动词后表示完成，例(3)中用在形容词后表示状态的实现，例(4)属于将来时，句子表示在相对参照时间之前已经完成的事件。例(5)是反问句，句末用“溜”更能强调对意外事实的惊讶或遗憾；例(6)祈使句末尾用“溜”，句子的表意和语气都更强硬，带有很强的指令役使意味。另外，答话时也可用在句末，如“吃啥？——吃溜，你呢？”这里“吃溜”应是口语里“吃溜饭咯”省略宾语的情况。

如果表示对已然事实的否定要用“没”，“溜”不再出现，例如：

- (7)吃溜饭咯。(肯定)——没吃饭。(否定)

如果表示对已然事实的疑问，常在句末加“啊没”，例如：

- (8)吃溜饭啊没？

“溜”也可用在“V+溜+C(方所)”中，相当于方位介词“到、在”等。例如：

- (9) a. 撩溜水里咯。(丢到水里了。) b. 挂溜墙上咯。(挂在墙上了。)

在“V+溜+C(方所)”的否定式中“溜”可有可无，出现时有突显方所补语的作用，这与“了₁”的用法不同。例如：

- (10)没掉地上，掉溜饭桌子上咯。(没掉地上，掉在饭桌上了。)

2. “V+C+溜”

与“了₁”不同，“溜”还可用在可能补语格式“V+C+溜”中。普通话“看得见、上得去、说得清、信得过”在昌乐话中的对应说法为“看着溜、上去溜、说清溜、信住溜”；否定式与普通话一致，都是“V+不+C”(例如“挎不动、拿不住”)；疑问式为“V+C+溜啊不”，普通话中“看得见看不见(看得见吗)? 上得去上不去(上得去吗)?”在昌乐话中的对应说法为“看着溜啊不? 上去溜啊不?”由于“溜”还是实现体标记，“V+C+溜”格式在昌乐话中就有歧义，这可

通过替换来检验：如果是表示实现或完成，通常用“V+C+咯”格式，相应的疑问式是“V+C+咯啊没”，其中“咯”不能替换为“溜”，“没”不能替换为“不”，若能替换就是可能补语格式。

另据观察，昌乐话中“V+C+溜”常与“还、就”配合，一般有前提条件句充当分句，传递出“出乎意外”的夸张意味，例如：

- (11)恁说囊么沉底个筐子，他还挎动溜。(你说那么重的个筐子，他竟然能挎动。)
 (12)张么大底个馒头，他就吃上溜。(这么大的个馒头，他竟然能吃完。)

如果是反问句，通常出现“会”，例如：

- (13)囊么沉底个筐子，他会挎动溜?(那么重的筐子，他能挎动吗?)

与附近临朐话的情况比较，两地所用格式一致，只是具体的补语用词不同或句末语气词的读音有差异。根据钱曾怡先生等调查^[5]，“看得见、信得过”在临朐话为“看见了、信着了”，相应疑问式为“V+C+了[liou⁰]啊吧”^②。另据张树铮调查，昌乐附近的寿光话中“了[lo⁰]”可以表示可能，相当于北京话作可能补语的“得了”，否定式为“V不了(“了”重读)”^[6]。昌乐话也有类似说法，但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例如：

- (14)还干动溜活，不给子女添麻烦。(还能干得动活，不给子女添麻烦。)
 (15)吃不了底吃，哈不了底哈，日子越过越好咯。(吃不完的吃，喝不完的喝，日子越过越好了。)
 (16)老牛干不了活，喘不了气咯，就等着死咯。(老牛干不动活，喘不动气了，就等着死了。)

李宗江认为普通话“V得了₁”表示动作V实现“了”这一结果的可能性，可省略中间的成分变为动结式述补结构；“V得了₂”表示动作V实现的可能性，不能省掉中间成分^[7]。昌乐话例(14)中“溜”单独出现在表可能的句中更像是“V+C+溜”格式中有时省略补语造成的，而且动词前一般需添加“能”凸显可能义，寿光话的情况是否也如此待验证。从读音来看，例(14)中“溜”与体标记读音相同，意义更虚化，整个结构与“V得了₂”更接近，按说是不能省略中间成分的，昌乐话偏偏相反，这使得“V溜”有歧义，因此昌乐话一般用“能干动溜活”来表达。特别注意的是昌乐话“不了”中“了”读音[liɔ²¹³]，与普通话接近，结合李宗江的研究来看^[7]，例(15)属于“V得了₁”的否定，例(16)属于“V得了₂”的否定，这完整保留了“V得了”的历史演化实例。从上述情

况来看,昌乐话的这种表达可能的句式处于萎缩状态,基本只保留在一些特定用例中,总体来看,可能义表达向普通话靠拢,已经主要由词汇成分“会、能”等承担。

通过比较来看,昌乐话的“溜”与临朐话“了₂[liou⁰]”、寿光话“了₂[lɔ⁰]”主体语法功能接近,只是语音形式和细微处的发展趋势有差别。

二、咯[luə⁰]、嚏[liä⁰]

昌乐话的“咯”和“嚏”通常都只能用在句末,与普通话事态助词“了₂”大致对应,但二者的具体分工不同。

1. 咯[luə⁰]

“咯”用来客观地表述事件已经完成,兼有对已然事态的确认语气,通常只出现在陈述句末、肯定祈使句末并且不能省略。与“了₂”不同,“咯”不能用在否定祈使句末、疑问句末等位置。例如:

(17)a. 活干完咯,歇歇吧。(干完活了,歇一歇吧。)

b. 水烧开咯,白添柴火嚏。(水烧开了,别添柴火了。)

(18)a. 早割溜棒槌子咯,恁看那北坡空荡荡底。(早割完玉米了,你看北坡空荡荡的。)

b. 喝溜喜酒咯,办事还刚麻利。(喝了喜酒了,办事还真快。)

(19)a. 那辆车子他推走咯,恁白找嚏。(那辆车子他推走了,你别找了。)

b. 快撵论,恁家底牛跑咯。(快追去,你家的牛跑了。)

(20)a. 哈酒咯,大爷! 等煞煞儿再炒菜。(喝酒了,大爷! 等会儿再炒菜。)

b. 把褂子上底灰抖巴咯!(把褂子上的灰抖掉了!)

例(17)表示“干完活、烧开水”已经实现并用“咯”加以强化确认;例(18)表示“割棒槌子、喝喜酒”已经实现并用“咯”加以强化确认;例(19)表示“推走、逃跑”已经实现并用“咯”加以强化确认。例(20)都是肯定祈使句,句末的“咯”不能换用“嚏”,而例(17b)“白添火嚏”和例(19a)“白找嚏”是表否定劝阻的祈使句,“嚏”不能换用“咯”。

我们注意到,昌乐城区或靠近潍坊市区的地方受普通话影响大多已使用“了₂[lɔ⁰]”,各地的年轻人也更常使用“了₂”。例(17)一(20)的“咯”都可替换成“了₂”,表意没什么变化。徐晶凝认为普通话时体标记词“了₂”正在向情态标记发展,可以看成

是语气助词的边缘成员^[8]。昌乐话的“咯”有时候时体意义的表达变得很模糊,例如“有溜钱就不一样咯”。这里“咯”的时体意义很弱,主要是表达对事态的肯定性评判语气。可以说,“咯”与“了₂”的情况很接近,也有向情态标记发展的趋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近年来“咯”被“了₂”快速替换提供了前提条件。

2. 嚏[liä⁰]

“嚏”通常只用在疑问句末、否定祈使句末尾(例(17b)、例(19a))和表强烈感叹的句子末尾,侧重表达对已然事态的强烈情感态度,与“了₂”的部分用法类似。再举几个用在感叹句的实例:

(21) 那个颜色着暗嚏!(那个颜色太暗了!)

(22) 这菜刚鲜亮嚏!(这菜太新鲜了!)

(23) 今每冷死嚏!(今天冻死了!)

“着”和“刚”是昌乐话里表极性程度的副词^[9],例(21)用“嚏”强化对颜色暗的程度远超预期的感叹,例(22)用“嚏”强化对新鲜程度远超预期的感叹;例(23)属于极性程度副词做补语的形容词谓语句,用“嚏”表示对冷的程度远超预期的强烈感叹。“嚏”在动词谓语句后,强化了对已然事态的主观评判语气。例如:

(24) 等恁觉乎,人家偷牛底早就跑远嚏!(等你发觉,人家偷牛的早就跑远了!)

(25) 你看你不好好拿着,掉(溜)地上嚏!(你看你不好好拿着,掉到地上了!)

例(24)用“嚏”表示小偷已经跑远了,同时强化了为时已晚的遗憾语气;例(25)用“嚏”表示东西已经掉到地上了,同时强化了对“掉东西”的责怨语气。

3. “嚏”和“咯”的分工及成因

昌乐话的“嚏”和“咯”在语义侧重和表达倾向上大致互补:“咯”多用于一般的陈述句中,故侧重客观陈述事实或传达偏向积极的意义,而“嚏”则侧重表达更为强烈的情感态度,有时过于强烈反而带有遗憾、贬斥的消极意味。再如:

(26)a. 他俩这刚熟和咯。(他俩现在很熟悉了。)

b. 他俩这刚熟和嚏!(他俩现在太熟悉了!)

例(26a)“刚熟和咯”只是对他们俩熟悉程度已经变化的事实性陈述,而例(26b)“刚熟和嚏”常附带有说话人对他们俩变得“过于熟悉”而超出预期

的负面看法。这在相当于普通话表示顺序义的“NP+了”句式中对对比尤为明显,例如:

(27)a. 谷雨咯,天越来越暖和咯。(谷雨了,天越来越暖和了。表示情况变好了的积极意义)

b. 谷雨噠,还没点豆子哩。(谷雨了,还没种黄豆。表示种黄豆的时间迟了的消极意义)

(28)a. 大学生咯,真不简单!(表示对已经成为大学生的赞美。)

b. 大学生噠,还没个正经。(表示对不符合大学生行为的贬斥。)

综合来看,昌乐话的“噠”和“咯”都能用在句末,但在句类的选择和表意上各有分工,可以把二者与普通话“了₂”的大致句法对应关系总结为下表:

	位置	陈述句	疑问句	祈使句	感叹句
了 ₂	句末	+	+	+	+
咯	句末	+	—	肯定类	—
噠	句末	—	+	否定类	+

可见,昌乐话是用“咯、噠”两个读音形式分担了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了₂”的功能。与之相应,“咯”注重对事态的客观陈述,“噠”则侧重表达对事态的强烈情感和确认态度。

那么,为什么昌乐话需要对这两种意义进行形式区分呢?据已有研究,区分现实(realis)和非现实(irrealis)是人们认识和把握事件的重要区分方式,对现实事件而言,还需要对其真实性加以不同程度的确证,这些认识都会在语言的时间表达方式上有所体现^[10]。据此,邹海清从事件现实性的程度差异和确证度的关联出发,提出普通话“了₂”的语法意义可概括为“侧重于表现事态现实性的变化义”和“侧重于表现事态真实性的确认义”两种^[11],这一重新概括简洁明了,克服了以往各种说法的不足。根据本文理解,把邹文对相应句法表现的分析对应到不同句类上,结果发现前一种语法意义可对应于一般陈述句和肯定祈使句等,后一种语法意义可对应于特定的感叹句、疑问句、否定祈使句和受限制的陈述句等。昌乐话“咯”和“噠”的语法意义和句法分工与邹文对“了₂”的分析有着很好的对应关系。换句话说,昌乐话的“咯”侧重表现事态的现实性,“噠”侧重表现对现实事态的主观确认态度。可见,昌乐话已经用不同的语音形式来标记人们对事件现实性和真实性的认知区分。与普通话只有一种读音形式相比,二者实际上处在不

同的发展状态上了。

三、汉语其他方言“了”类标记的分化情况

与普通话“了”只有一个读音形式不同,各地方言里“了”类标记在句中和句末读音不同的情况特别常见。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第064图,以“他来了。三天了。”为代表例句的方言分布在山西全部、陕西中北部、河北中部、河南北部、山东中西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江西大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等广大区域^[12]。但像昌乐话“了₂”再次出现分化的情况尚不多见。目前来看,河南汝南话的情况极为类似。据张宝胜调查,汝南话(中原官话陈蔡片)“了”类标记有三个,相当于“了₁”的是[liɑu⁰] (例(29)),相当于“了₂”的有[lə⁰] (例(31))和[lɛ⁰] (例(30)),读[lɛ⁰]时单纯陈述客观事实,属于行域(现实的行为和行状),读[lə⁰]时属于言域(用以实现某种意图的言语)^[13-14]。例如:

(29)他前几天买了一辆新车([liɑu⁰])。③

(30)他闺女学习可好,今年考上北大了([lɛ⁰])。④

(31)你知道呗,他闺女学习可好,今年考上北大了([lə⁰])。

有些方言中句末的“了”也有两种读音,只是其中一种读音与“了₁”相同,另一种则不同。这种情况见于山东沂水、沂源、莱州等地。例如(以下例句均转引自高晓虹^[15]):

(32)沂水:她也说开唠,也作唠一个诗。|碗叫我打嘴。

(33)沂源:他来唠好几天唠。|他早就来嘴。

(34)莱州:桑树知道以后就长气啦,最后气得破喽肚子啦。|接着就天开云散喽。

根据高晓虹的梳理材料,沂水和沂源的“唠”用来表示“客观的叙述”,“嘴”则“往往表示强烈的语气”,沂水方言里还带有“遗憾、可惜或不可复得的意思”;莱州的“喽”用来表示“客观的叙述”,“啦”则“往往表达一种意外、感叹”^[15]。鉴于以上调查材料尚不够精细,目前尚难以确定各地出现分化的原因是否完全一致。但至少表明,昌乐话“了”类标记一分为三的情况不是孤立的。

此外,有学者注意到某些方言“了₁”的对应形式也有分化,如河北魏县^[16]和河南林州^[17]、安阳^[18]等地方言。这样一来,方言“了”类标记和普通话

“了”的对应关系就更加复杂了。进而言之,若继续根据某一方言的情况来判定普通话“了”的分合就只能出现歧见纷现的局面。因此,最好用平等的目光看待普通话和方言,从“整体汉语”出发,视之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语言现象,以免盲目类比而导致莫衷一是。

四、方言“了”类标记分化的可能动因

1. 系统内形义关系调整促成语音形式分化

任何语言的语法系统都是不自足的,总是存在着某些语法形式的缺位,这促使语言自身根据需要进行补位和系统整合,以实现语法系统的匀整和谐。具体到形义对应关系来说,一种语言总是尽力由形式和意义不完全对应的非理想状态调整为一一对应的理想状态。就普通话而言,通常认为“了”是以一种读音形式对应不同的功能和意义(一对多),这显然不是理想的对应状态,留有调整空间。实际上,郭小武发现普通话口语中“嘞、喽”都属于“了₂”的变韵形式,其中“嘞 lei”侧重“表达肯定、认可或终于如愿的语气”,如“下车嘞!”,“喽 lou”表示“向别人宣布情况有所改变的消息”或“情况有所改变的假设”,如“水开喽!”^[19]另外,高晓虹也注意到威妥玛《语言自述集》记录了类似现象:老北京话句尾“咯”(现已经消失)“往往带有比较强烈的语气”,“了”则没有^[15]。这表明,普通话口语或老北京话里的情况有所不同,可能已经出现了往理想化对应状态发展的趋势。

放开思路,方言实际上也是语言,有着自身的独立性和系统性,也会不断自我调整,满足方言群体日益精细的表达要求。就汉语方言而言,《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第064图中以“他来了。三天了。”为代表例句的方言点则已经采用不同的语音形式对应不同的功能和意义^[12],以求更符合一一对应的理想状态,这是方言语法系统自我调整功能的具体表现,这种自我调整的过程必然是与普通话不同步的,调整的结果自然就不可能完全一一对应了。昌乐话的“溜”与“了₂”不能完全对应,“咯、嘍”分工承担了大致相当于“了₂”的功能,这是昌乐话基于表意需求来主动调整完善自身语法系统的必然结果。河南汝南和山东沂水、沂源、莱州等地的类似分化情况,自然也离不开各地方言自我完善的内在需求。

2. 方言接触渗透导致的异语语法成分竞争

语言接触是语言演变的重要外部原因,方言中“了”类标记形成和演变过程中免不了受到来自普通话和方言、方言和方言之间接触渗透的影响。根据高晓虹和本文补充统计,目前山东方言“溜、嘍”的使用情况大致是:德州、宁津、无棣、临朐、乐陵等地用“溜”,淄博、无棣等地^⑤用“嘍”,寿光^{⑥[20]}、沂水、沂源、博兴等地^[15]用与“嘍”接近的“嘍”。这些地点都在山东中西部地区,与冀鲁官话有密切关系。从与“溜、嘍”的地域分布对应来看,昌乐话与冀鲁官话的关系更密切。这从山东历史上的移民情况也可得到印证。明朝时,山东中西部地区曾因战争和疾病人口急剧减少,政府被迫从山西洪洞^[21]和河北枣强^[22]等人口富余地区向该地区大量移民。昌乐和上述地点都在该移民区域内,因此有着同样的移民来源。同样的移民来源自然容易造就方言使用上的较大一致性。换句话说,昌乐等地“溜、嘍”的地理分布情况也是该地区历史移民来源一致性的“方言化石”。当然,“溜、嘍”是否属于移民来源地的方言遗迹尚需更全面深入的研究才能确认。

当下最为普遍的接触是普通话推广带来的普方之间表示相同语法意义成分的竞争现象。昌乐城区或靠近潍坊市区的地方受普通话影响大多已使用“了₂”,特别是年轻人大多不再使用老派的“咯”,这可以说是新一轮的成分替换过程。类似这样的大规模动态接触过程正是观察方言接触的鲜活样本,值得今后的方言语法调查特别关注。

五、结 语

关于汉语方言语法的差别,汪国胜先生曾指出“跟普通话比较,南方方言差异相对明显,容易发现‘特殊’;北方方言往往表面上不容易看出差异,相对来说难以发现问题,这就特别需要关注细节,从深层次上多加观察”^[23]。昌乐话属于北方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就需要从细节上去深入观察。类似昌乐话“了”类标记的情况不是孤立的,今后在调查单点方言语法现象时,重视方言语法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在透视语法细节的基础上,与其他方言中的类似情况加以横向比较,有助于加深对汉语方言乃至包括普通话在内的“整体汉语”的认识,揭示出普通话和北方方言之间“大同小异”的系统性差别。

注释:

- ① 本文统称方言里“了₁”和“了₂”对应形式为“了”类标记。
 ② 临朐方言的情况来自钱曾怡等《临朐方言简记》,参见《钱曾怡汉语方言研究文选》(2008:205)。
 ③ 转引自张宝胜^[13]。
 ④ 例(30)(31)均转引自张宝胜^[14]。
 ⑤ 高晓虹(2010)认为“嚏”可能由“啊[1ia]”进一步弱化变来,“嘯”由“啦[1a]”弱化变来,我们认为“嘯[1ā]”很可能是“嚏[1iā]”丢失介音成分造成的,因为二者都属于韵母鼻音化的情况,谈不上弱化。
 ⑥ 张树铮《寿光方言志》(1995)标音为“嘯[1ā]”,张树铮(1995)记录寿光话相当于“了₂”的为“啞[1æ]”,两处记音略有出入。

参考文献:

- [1] 洪波. 从方言看普通话“了”的功能和意义[J]. 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 1995(1): 10-14.
 [2] 史冠新. 普方古视角下的“了₁”“了₂”“了₃”研究[J]. 东方论坛, 2006(3): 53-59.
 [3] 钱曾怡. 山东方言研究[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1.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 第2版[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5] 钱曾怡. 钱曾怡汉语方言研究文选[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8.
 [6] 张树铮. 山东寿光方言的助词[J]. 方言, 1995(1): 49-50.
 [7] 李宗江. “V得(不得)”与“V得了(不了)”[J]. 中国语文, 1994(5): 375-381.
 [8] 徐晶凝. 情态表达与时体表达的互相渗透——兼谈语气助词的范围确定[J]. 汉语学习, 2008(1): 28-36.
 [9] 周安, 王桂亮. 昌乐话几个特色程度副词的比较[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3(1): 69-71.
 [10] 张伯江. 认识观的语法表现[J]. 国外语言学, 1997(2): 15-19.
 [11] 邹海清. 句尾“了”的语法意义[J].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4(4): 177-186.
 [12] 曹志耘. 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13] 张宝胜. 河南汝南话的“了₁”和“了₂”[C]//邵敬敏. 21世纪汉语方言语法新探索(第三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8: 121-128.
 [14] 张宝胜. 也说“了₂”的行、知、言三域[J]. 中国语文, 2011(5).
 [15] 高晓虹. 助词“了”在山东方言中的对应形式及相关问题[J]. 语言科学, 2010(2): 177-186.
 [16] 吴继章. 河北魏县方言的“了”——与汉语普通话及其他相关方言、近代汉语等的比较研究[J]. 语文研究, 2007(3): 35-47.
 [17] 陈鹏飞. 林州方言“了”的语音变体及其语义分工[J]. 南开语言学刊, 2005(1).
 [18] 王琳. 安阳方言中表达实现体貌的虚词——“啵”、“啦”及其与“了”的对应关系[J]. 语言科学, 2010(1): 64-72.
 [19] 郭小武. “了、呢、的”变韵说——兼论语气助词、叹词、象声词的强弱两套发音类型[J]. 中国语文, 2000(4): 349-362.
 [20] 张树铮. 寿光方言志[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5.
 [21] 曹树基. 中国移民史(明时期): 第五卷[M]. 葛剑雄, 主编.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22] 张金奎. 明代山东地区枣强裔移民考[J]. 古代文明, 2011(4): 93-102.
 [23] 汪国胜. 谈谈方言语法研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5): 91-99.

责任编辑: 刘伊念

(Email: lynsy@jhun.edu.cn)